

## 古冢耕影：宋辽金墓葬中的农耕图像及其象征意义

韩晓芬 李 群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宋与辽金墓葬中频繁出现以“农耕”为主题的壁画或砖雕图像,按内容可分为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耕作、放牧、粮食加工图以及农业生活的租佃纳贡图。农耕图像在宋辽金时代不同政权下客观存在,展现了宋、辽、金人在不同地域、民族、风俗文化之间频繁互动的交融性和一致性,表达了地域风俗、农业文化以及庇佑子孙的精神信仰。农耕图像的生成动因与思想观念、社会背景以及墓葬习俗息息相关,内容暗喻“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依赖关系,其意义并非仅作为彰显财富的符号象征,还意在表达地主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以及对佃农勤耕务农的期待。

**【关键词】**宋辽金墓;农耕图像;信仰文化;生成动因;象征意义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5)01-0039-14

### The Image of Farming in Ancient Graves: the Causes and Symbolic Meaning of Farming Images in Grave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Liao Jin Dynasties

HAN Xiaofen LI Qun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e murals or brick carvings with the theme of "farming" frequently appeared in the tombs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those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uch as farming, grazing, grain processing, and those of tenants and tribute payment in agricultural life. The agricultural images existed objectively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in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showing the blending and consistency of frequent interactions among people in different regions, ethnic groups, and customs and culture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They also expressed regional customs,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spiritual beliefs in protecting the descendants. The causes of the 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imag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ideas, social background, and tomb customs. The content implies the dependence between "landlords" and "tenants". Their significance is not only as a symbol to highlight wealth, but also to express the landlords emphasi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e expectation of tenants to work hard in farming.

**Key words:** tomb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Dynasties; agricultural images; belief culture; generating motivation; symbolic meaning

在中国古代,墓葬壁画是墓葬装饰的重要元素之一。墓葬壁画不仅是艺术自身演化的结果,更是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变迁过程的产物。社会结构、祭祀礼俗、墓葬空间等因素的变化,对墓室壁画的内容产

[收稿日期] 2024-03-29

[作者简介] 韩晓芬(1992- ),女,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图像史;

李 群(1960- ),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生一定的影响<sup>①</sup>。反之,图像的内容、形式亦直接或间接展现出与当时的社会制度、礼仪、民俗建立起来的结构性联系。如何解读墓葬图像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及意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农耕图像作为一类颇具特色的图像,通常绘以耕种、畜牧、粮食加工等题材,以壁画、砖雕、石刻等艺术手段结合制成运用在墓葬装饰中,兴起于西汉、流行于东汉、盛于魏晋,在历经唐代之际于宋时期墓葬中再度出现。

鉴于墓葬中农耕图像的特殊意趣和丰富内涵,以及阐释文字的稀缺,在不同时期以及文化背景下仍能保持较为稳定的流行,自然引起学界争鸣。第一类学者认为图像记录了当时的农业生产状况,从农耕图像中识别相关证据,证明文献中记载的农具、农业技术真实度,如汉代画像石<sup>②</sup>、魏晋时期墓葬壁画<sup>③</sup>等研究,此类研究主要将墓葬中的农耕图像视为文字资料的“佐证”。第二类学者认为农耕图像作为一种象征符号存在于墓葬中,如汉代农耕画像石,孙彦认为是庄园经济发展、贵族地主精神生活的体现<sup>④</sup>。第三类学者认为农耕图像是表现日常生活活动或孝子行为,将农耕图像归纳在日常生活场景<sup>⑤</sup>或孝行图<sup>⑥</sup>中进行研究。应该说,前人对墓葬中农耕图像的时代背景与关注焦点不同,上述观点从特定的角度出发,能够自圆其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农耕图像本身源于生活,且易理解,受地域文化及需求影响,对其进行摹绘、仿作或改编,任何从单一角度入手所得结论都值得进行反思。墓室内的农耕图像本身与“丧葬”“祭祀”等主题紧密相关,本质上为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要深入研究需置于具体创作与存在的语境中去,以便理解图像的具体功能、价值和意义<sup>⑦</sup>。总体而言,前辈学者对于中国古代墓葬中农耕图像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一时期图像的研究,尚未关注到同一时期多民族地区在墓葬中对同一式样的农耕图像的运用。

宋与辽金时期,在不同民族区域通常会出现摹绘或运用同一题材农耕图像,对此,虽偶有学人注意<sup>⑧</sup>,但惜至今无人对此做过专题研究。宋辽金时期墓葬中的农耕图像在不同政权下客观存在着,不仅反映了辽金人对汉人农业生产学习化的进程,还反映了对汉文化礼仪习俗的自觉接受与改造。研究这批图像对了解当时民间农业文化、礼俗互动以及身份认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对宋辽金时期墓葬中所出现的农耕图像进行梳理,探究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情与互动,分析农耕图像在墓葬中的信仰文化、生成动因,继而探讨农耕图像中所绘人物之间的联系从而析出农耕图像在墓葬中的象征意义。

## 一、图像的种类与内容

墓葬中的农耕图像,主要指在墓室内雕刻或绘制与农耕相关的图像。早在汉晋时期,墓室内发现大量农耕图像,内容集中表现农牧、耕种、渔猎、手工业等场景,分布于我国南北地区,较为广泛。唐五代时

①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6-7页。

② 夏亨廉、林正同主编:《汉代农业画像砖石》,中国农业出版社,1996年,17-147页;刘兴林:《汉代农业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郜媛媛:《地域传统与图像表达——汉画像中的牛耕图》,《农业考古》2016年第6期。

③ 孙彦:《试论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农具与农业生产:以河西走廊墓葬壁画为例》,《农业考古》2008年第4期;董佩东:《河西魏晋十六国壁画墓农作图的整理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④ 孙彦:《汉代“农耕图”题材寓意辨析——兼论壁画墓的起源》,《苏州文博论丛》2015年年刊。

⑤ 王伯敏:《中国绘画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340页。

⑥ 邓菲:《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图像题材探析》,《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陈章龙:《由墓葬装饰品看赵宋王朝北方“民间盛宴”》,《民俗研究》2013年第4期。

⑦ 王加华:《中国古代农耕图像研究的理念与方法》,《中国农史》2023年第6期。

⑧ 王一凡:《北宋时内亚因素对中原汉文化之影响——北宋与辽金交界地带墓葬分析》,《中原文物》2017年第1期。



期,虽图像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石窟内,但在墓葬中仍有零星发现。大约自北宋元丰年间开始,农耕题材图像在北方地区仿木结构砖室墓中愈发兴盛起来。在目前所见材料中,宋与辽金时期墓葬中的农耕图像主要分布在今山西、河北、甘肃一带。图像通常以壁画或一砖一画的砖雕形式置于墓葬主室的内壁,也有部分发现在甬道和额枋上,做工精湛,且内容并不局限于表现劳作相关题材,图像内容从功能层面可分为生产类、生活类<sup>①</sup>。其中农业生产图像包含耕获图、牧养图、粮食加工图三类以及与农业生活相关的租佃纳贡图像。



图1 河北井陘县柿庄二号墓 耕获图

第一类是农夫使用农具进行田耕、收获活动的耕获图。如金初时期河北井陘县柿庄二号墓,在墓室内东壁南侧额枋(图1)<sup>②</sup>绘耕获图,分左、右两部分,左部绘一头黄牛正拉着带有耒斗的双脚耒车,右部一男子正手持镰刀割谷物,另一老者头戴黑色皂巾,胯脚挽至膝上,双手至于膝前正弯腰做收获状,描绘了收割粮食的场景<sup>③</sup>。图像中细致地描绘了“耒车”的耒斗、架、腿以及铧。王祯对此农具做过详细说明,耒车为下种器“两柄上弯,高可三尺,两足中虚,阔合一垄,横枕四匝,中置耒斗,其所盛种粒各下通足窍。仍旁挟两辕,可容一牛,用一人牵,傍一人执耒,且行且摇,种乃自下”<sup>④</sup>,文中还记录耒车的施肥功能“近有创制下粪耒种,于耒斗后别置筛过细粪,或拌蚕沙,耩时随种而下,覆于种上,尤巧便也”<sup>⑤</sup>。耒车省时省力使用率较高,在宋代就已经用于施肥<sup>⑥</sup>。

无独有偶,山西大同东风里辽晚期墓墓室西壁也出现一幅生动的田间劳作图(图2)<sup>⑦</sup>,在画面左侧上方,图中所绘耒车与井陘县二号墓相差无几,形象地绘制一男子手扶耒车正在进行农耕活动,耒车前部由牛牵引。耒车上部绘两男子在田间锄地画面,其中一人手持锄



图2 耕获图 山西大同东风里辽墓

① 隋斌:《中国古代农耕图像作用与分布探究》,《古今农业》2020年第3期。

② 图1引自唐云民:《河北井陘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图版肆。

③ 唐云民:《河北井陘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④ [元]王祯著,王毓瑚校:《王祯农书》农器图谱之二,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212页。

⑤ 同上。

⑥ 曾雄生:《下粪耒种发明于宋代》,《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3期。

⑦ 图2引自刘俊喜、侯晓刚、江伟伟等:《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封二。



头抬手擦汗,正回望远方肩扛扁担的农妇。在楼车下部绘制田地上长出的庄稼<sup>①</sup>。辽人所绘农耕图似乎对场景内容的表达更为丰富,不仅增加了农人的农业生活,绘制茅屋、农妇挑担送饭的场景,还绘以犁痕增加生动性。而在壁面右边上部绘制男子牵着驾辕驼的出行图,右下部绘制二男子牵马出行图以及骑马图,高大的骆驼、鞍马形象以及农耕场景使得农耕与游牧民族生活的主要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壁面对不同主题图像面积分布的情况,以及壁面上隐约现出的废稿残图,使得辽汉文化结合的生涩尝试不言而喻。

第二类是饲养牲畜的牧放和圈养形式的牧养图,牲畜主要以马、牛、羊为主。在河北井陉县柿庄六号墓中南壁,墓门东侧绘牧羊图(图3)<sup>②</sup>,一牧童头戴毡笠,身着窄袖衣衫,右手握长鞭,左手指向羊群,羊群姿态各异,共有十只。西侧为牧牛、马、驴图(图4),牧童左手提网兜,右手扬鞭,在芦苇河边赶牧,牲畜中有黄牛三头以及马、驴各一匹<sup>③</sup>。牧养图在山西地区发现尤多,尤其山西屯留金墓中绘制牧牛图(图5)<sup>④</sup>、畜养图(图6)<sup>⑤</sup>,畜养图中所绘制的“二牛同槽”“同服牛马”题材以前较为少见,可直观看到牛颈部肩峰突出的特征,为典型的瘤牛品种<sup>⑥</sup>。与之类似的还有沁水县宋墓雕砖<sup>⑦</sup>、故县村二号宋墓<sup>⑧</sup>、阳泉平定县东回村宋墓<sup>⑨</sup>、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sup>⑩</sup>、山西昔阳宋金墓<sup>⑪</sup>等描绘了宋金时期畜牧以及牧养场景,可见山西畜牧业之发达。牧养图多集中于河东路(今山西),这种现象与其社会经济文化面貌的改变是分不开的。北宋与辽对峙,金灭辽后北方大部分地区被金人统治,由于金人主渔猎的生活方式,其农业并不发达,故山西各地沿袭旧法的同时加强畜牧业。况且河东一带山区面积广大,自然条件利于发展畜牧业,欧阳修就曾言“河东一路,水草甚佳,地势高寒,必宜马性”<sup>⑫</sup>。



图3 井陉县柿庄六号墓 牧羊图



图4 井陉县柿庄六号墓 牧牛、马图

① 刘俊喜、侯晓刚、江伟伟等:《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期。

② 图3、4引自《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13页。

③ 唐云民:《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④ 图5引自朱晓芳、杨林中、王进先等:《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8期。

⑤ 图6引自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第3期。

⑥ 伊宝、高策、史宏蕾:《农牧业视角下宋代山西寺观壁画牛图考》,《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⑦ 李奉山:《山西沁水县宋墓雕砖》,《考古》1989年第4期。

⑧ 朱晓芳、王进先:《山西长治故县村宋代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4期。

⑨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定县东回村古墓中的彩画》,《文物》1954年第12期。

⑩ 商彤流、袁盛慧:《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简报》,《文物》1996年第5期。

⑪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昔阳县文物管理所,昔阳县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四面栏杆彩画檐——山西昔阳宋金墓的发现与保护》,《中国文物报》2015年6月5日,第8版。

⑫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98,中华书局,1985年,第4937页。





图5 山西屯留金墓 牧牛图



图6 山西屯留县金墓 畜养图

第三类是绘制用石磨、踏碓以及筛具等处理原粮活动的粮食加工图。图像主要集中于山西、宁夏、甘肃一带的宋金墓葬中。如山西长治故县村宋墓二号,墓室南壁墓门两侧绘舂米图、磨面图、筛米图(图7)<sup>①</sup>。墓门左侧绘舂米、筛米图,图中男子身穿黑色衣袍,裤腿卷起,双手扶栏立于舂米架上,右脚踏米碓木杠一端。男子前方蹲坐一妇女,手捧簸箕做筛米状。墓门右侧为磨面、筛米图,一妇女与一男子站立石磨盘两侧,男子身着短襟与长裤,头梳高髻,妇女身着短襟上衣与布裙,二人双手持磨杆呈逆时针旋



图7 山西故县二号墓壁画 舂米、磨面、筛面图

转推磨。磨面图后绘席地盘坐且手捧簸箕的妇女,旁置一簋一筐<sup>②</sup>。《诗经》中所载“或舂或揄,或簸或蹂”<sup>③</sup>正是描述其图像中处理粮食的原生态方法。不唯如此,就目前考古发现情况来看,这类粮食加工图像在晋中、南等地所见尤多,如长治故漳村宋墓<sup>④</sup>、沁水县宋墓<sup>⑤</sup>、五马村宋墓雕砖<sup>⑥</sup>、山西壶关县上好村宋金一号墓<sup>⑦</sup>、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sup>⑧</sup>、绛县裴家堡金墓<sup>⑨</sup>。甘肃地区同样出现以雕砖制作方式为主的

① 图7引自徐光冀:《中国出土壁画全集·山西》,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

② 王先进:《山西长治故县村宋代壁画墓》,《文物》2005年第4期。

③ 陈子展著,徐志啸编:《诗经直解》卷24,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30页。

④ 朱晓芳、王进先、李永杰:《山西长治市故漳村宋代砖雕墓》,《考古》2006年第9期。

⑤ 李奉山:《山西沁水县宋墓雕砖》,《考古》1989年第4期。

⑥ 王进先、石卫国:《山西长治市五马村宋墓》,《考古》1994年第9期。

⑦ 杨林中、王进先、畅红霞等:《山西壶关县上好村宋金时期墓葬》,《考古》2012年第4期。

⑧ 朱晓芳:《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8期。

⑨ 张德光:《山西绛县裴家堡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此类图像,如环县宋墓雕砖<sup>①</sup>、泾源宋墓<sup>②</sup>、甘肃静宁金代墓葬<sup>③</sup>、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金墓<sup>④</sup>等,图像中除了人物性别、人数有差,其内容形式无较大差异,由此可知粮食加工图像范式影响深远。

从以上图像发现,墓葬中的粮食加工图与上述山西、甘肃东部地区出现的畜养图大多位于同一墓葬中,而这主要是由于这一地带位于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宜农宜牧,并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游牧民族的畜牧业与当地的农业生产方式进行了互补,成为其谋生手段,农牧两种方式都占有重要的地位<sup>⑤</sup>。

第四类是农业生活中收租纳贡活动的租佃纳贡图像。山西阳泉平定西关村金墓西壁绘制了一幅进奉场景图,画面中共四人,右侧一头戴黑色软脚幞头的男子扭身向后,身穿白色圆领窄袖长袍,着淡青色长裤,足蹬黑勒靴。男子左手提长袍下摆,右手向身后作催促状。随后紧随三人,其中两人前后共提一环扣斗形箱,箱内置五瓶酒和一件物什。两人穿着相仿,戴黑色无脚幞头,穿淡青色或绿色圆领上襦,袖管高挽,腰系绿色腹围,着白色长袴、便鞋。提箱前者男子正扭头与身旁的捧盘人交谈,捧盘者头顶青色花帕,梳披肩发,穿淡青色圆领窄袖长袍,腰系黑带,手捧一葵口圆盘,盘内置六只小罐<sup>⑥</sup>。除此之外,墓中还绘制尚宝、尚物以及马厰、驼运图等,显然展示了当地豪绅的生活场景,而进奉图正是表达了佃农向当地豪绅纳贡的含义。

如果说这些图像主题表达得不够清晰,在河南地区墓葬中发现的纳贡、商品贸易图描绘了佃农向当地豪绅纳贡的整个流程,为其做了补充和解释。白沙一号墓甬道东壁(图8)<sup>⑦</sup>图像绘有三人,一头部系蓝巾,着圆领窄袖淡蓝色衣衫的老者独自站立一旁,面向西部露出半边身子,似正做启门状。另两人头包幞头,黑、白色各一,其中一男子与启门男子上衣相同,下身着窄腿浅蓝色袴,足蹬草鞋,双手捧红蓝筒囊,面向门,表现出急于进门的姿态。另一人左肩挎钱贯,与前者衣着相同。紧接在前室南壁东部绘制与甬道装束相同的两人,两名头包黑色幞头男子似为纳贡者在门口等候的场景(图9),动作场景相呼应,表达二人正通过甬道走向前室。在后墓室东南壁砖砌帐幔下左侧绘俩女子,女子头梳高髻戴簪端坐椅上,身着窄袖蓝色衫裙,外搭绛色褙子。其中一女子手握银铤,正身体前倾似与纳贡者交谈,二人中间置一赭色高几,桌上放置铤与圆形物件各一。画面右侧两名纳贡者一人手捧黑色篮子,篮中放置铤物圆形物,另一人手捧钱贯,二人共同看向左侧两女子。在男子身后站立一女子,双手环抱筒囊,装束与左侧二女子相同(图10)。



图8 白沙宋墓甬道 收租图

对此,宿白先生指出图像虽不一定与墓主现实生活相符,但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片段,而这一片段与墓主人社会生活相称,并推测墓主身份为地主,还可能兼营商业<sup>⑧</sup>。显然,图像绘制了佃农从进入地主家门,被仆人引导通过层层门卡直到见到主人后进行纳贡的整个流程。

① 张亚萍:《甘肃环县宋代彩绘砖雕墓》,《文博》2003年第3期。

② 钟侃:《宁夏泾源宋墓出土一批精美雕砖》,《文物》1981年第3期。

③ 刘玉林:《甘肃静宁发现金代墓葬》,《考古》1985年第9期。

④ 蔡宇琨:《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董湾村金墓》,《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

⑤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6页。

⑥ 商彤流、袁盛慧:《山西平定宋、金壁画墓简报》,《文物》1996年第5期。

⑦ 图8、9、10引自宿白:《白沙宋墓》,第2版,文物出版社,2002年,图版贰柒、贰玖、叁贰。

⑧ 宿白:《白沙宋墓》,第2版,第26-42、103-104页。





图9 白沙宋墓前室 收租图



图10 白沙宋墓后室 收租图

此外,在尉氏县张氏镇宋墓<sup>①</sup>、新安县李村墓<sup>②</sup>以及宜阳县莲庄乡坡窑村石棺后档线刻<sup>③</sup>均发现收租纳贡图像。值得注意的是,在尉氏县张氏镇墓中还绘制了商品贸易图(图11)<sup>④</sup>,内容描绘在祥云缭绕的建筑前面一人手捧放置银铤货币的托盘,旁者手捧方盒,对面一男子持秤作称量状,旁边一人弯腰作揖。图像以四个不同的人物动作刻画了一幅商品买卖的生动场面,而在左侧稍远处一女子肩挑扁担,从远处走来,露出羡慕的神情。画面惟妙惟肖,刻工若不是见过此情此景或感同身受,如何能绘得如此细微。正如《东京梦华录》中描写“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sup>⑤</sup>,图像正是描绘了当时街巷贸易的繁荣景象,借此来展示墓主雄厚的财力。



图11 张氏镇墓 商品贸易图

综上,农耕图像展现出宋、辽、金不同地域、民族、风俗文化之间的频繁互动,尤其辽、金墓葬中农耕题材内容、形式与宋的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民族文化融合过程较为久远。此外,农耕题材图像与梳妆、宴饮、灯擎与家具、假门、镜架、衣架等生活场景在墓葬中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sup>⑥</sup>,整体意趣指向了浓厚的世俗色彩。

① 刘迎春:《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3期。

② 俞莉娜、张剑葳、于浩然等:《新安县石寺李村北宋宋四郎砖雕壁画墓测绘简报》,《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年第1期。

③ 李献奇、张应桥:《河南宜阳北宋画像石棺》,《文物》1996年第8期。

④ 图11引自刘迎春:《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3期,封二。

⑤ [宋]孟元老撰,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第2版,中华书局,2007年,第144页。

⑥ 邓菲:《宋金时期砖雕壁画墓的图像题材探析》,《美术研究》2011年第3期。



## 二、图像中蕴含的信仰与文化

农耕图像在创作过程和应用中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墓葬这一特定的礼仪空间中满足逝者或墓葬建造者等发起者的精神需求。

其一,图像与地域风俗。以粮食加工图像为例,就上述材料可知,此类图像分布于山西东南部地区9处(长治共7处、晋城沁水县1处、运城绛县1处),甘肃环县和清水2处以及宁夏泾源地区1处,这些地方属农牧兼容地带。山西东南部地区地处黄土高原,汾河由北向南流经高原,为半湿润半干旱地区,且降水量有限,粮食作物主要以旱地作物小麦、粟、菽等为主<sup>①</sup>。王祯在《农书》中记载:“大、小麦,北方所种极广。大麦可作粥饭,甚为出息。小麦磨面,可作饼饵。”<sup>②</sup>如山西绛县裴家堡金墓中所绘图像元素包含磨盘、舂碓、辘轳加以灶具<sup>③</sup>,展现粮食“舂之于臼,簸箕秕糠,爨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sup>④</sup>的加工过程。而甘肃、宁夏一带同处黄河流域“地绕五谷,尤宜稻麦”<sup>⑤</sup>。在西夏文法典黑水城文献《天盛律令》中用西夏文记载了一段关于京城五郡县按地区交税纳粮的情况,小麦和大麦由灵武郡(今宁夏吴忠市)人和保静(今宁夏永宁县)人交纳,描述粮草均以捆袋、捆绳、囊袋以缴租之物<sup>⑥</sup>。文中指出这一地带以大、小麦为实物缴纳地租,而这也同时交代了当地的粮食品种,粮食的地域性反映出地域风俗文化,可见,图像中所描绘的实为当地的地域风俗。而墓葬中对粮食加工图像的大量描绘不免为地主借以表达“重粮祈丰”的美好愿望。

其二,“庇佑子孙,利于教化”的精神信仰。唐代张彦远认为图画可“成教化,助人伦”<sup>⑦</sup>,指出图像具有教化功能。在元代农书《农桑辑要序》中记载:“读《孟子》言,见其论说王道,丁宁反覆,皆不出乎‘夫耕,妇蚕,五鸡二彘,无失其时;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数十字而已。大哉,农桑之业!真斯民衣食之源,有国者富强之本。王者所以兴教化、厚风俗、敦孝悌、崇礼让、致太平,跻斯民于仁寿,未有不权舆于此者矣!”<sup>⑧</sup>又指出农桑之业是“兴教化”的基础,宋、辽、金墓葬中的农耕图像充分地体现了这两点。农耕图像的教化功能与墓主的地主身份密切相关,北宋《政和五礼新仪》品官丧仪条中明确限定墓志为中上层官员逝后特有殊荣,具有等级性,也就是“非官不志”。而辽金撰写墓志的习俗由中原传入,自然遵循“非官不志”的传统<sup>⑨</sup>。虽然在宋辽金时期的大多数仿木结构砖室墓中并未见到墓志,但在考古资料的陆续发掘中仍发现几例平民墓中带有墓志,如河南焦作出土的一座仿木构单室砖雕墓,墓志铭文中载该墓主人葬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墓主刘智亮为“以农兴家”的富民<sup>⑩</sup>。又如晋城发掘的陵川县玉泉村仿木结构金墓,墓中明确记载时间为金大定九年(1169),明确指出墓主为农桑富户<sup>⑪</sup>。内容强调墓主以“农”为富,而平民想要建造此类奢华的墓室,也只有这些拥有财力的富民能够实现。正如迪特·库恩

① 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② [元]王祯著,王毓瑚校:《王祯农书》百谷谱集之一,第84页。

③ 张德光:《山西绛县裴家堡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

④ [汉]王充著,黄晖撰:《论衡校释》卷12量知篇,中华书局,1990年,第550页。

⑤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486,第14028页。

⑥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等编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5催缴租门,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89页。

⑦ [唐]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1叙画之源流,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1页。

⑧ [元]司农司编,石声汉校注:《农桑辑要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

⑨ 王蕊:《人情·突破·虚实:金代汉文墓志撰写研究三题》,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59页。

⑩ 赵德才、马岩波:《河南焦作宋代刘智亮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

⑪ 李建生、商彤流、郑林有:《山西陵川玉泉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9期。



(Dieter Kuhn)在1994年提出几乎所有出土的11和12世纪的墓葬里的图画,包括逝者的肖像,都不担任朝廷高官,而是地方上有财富、权力和威望的商人、地主<sup>①</sup>。林文勋指出宋时期的富民是“靠财富和文化在社会上立足”的阶层,其“富民”阶层也是乡村经济关系的核心。从宋代户等制度的层面来看,富民应是指乡村五等户制下的上三等户<sup>②</sup>。那么,绘制农耕图像的墓葬墓主至少是三等及以上的地主富商。

地主通常拥有大量的土地并将其租借给佃农,而后通过收取粮租获得财富,这是家族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还可凭其经济实力,利用囤积手段操纵市场,予以获取超额利润。又因粮食产量的丰歉程度直接影响地主的经济利益,故地主极为重视。同时,中国古代社会墓地“场所”是凝集家族意识的地方,也是家族成员进行家族教训最有力度的场所<sup>③</sup>。足可见,地主正是因农业生产直接影响家族经济利益,需世代予以重视,进而通过绘制农耕图像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并在墓葬中实现家族的族训教化。此外,墓主训化后人重视农业生产,也是先人对子孙后代永享安乐荣华的祈望,如在河南焦作宋代刘智亮的墓志中就刻有“保子荣孙,富贵长久”<sup>④</sup>的文字,可见,农耕图像在实现教化目的的同时希冀子孙永保富贵。

其三,“不误农时,勤农务耕”的期盼。在山西长治小关村金代砖室墓西壁中部破子窗棂下绘制磨盘、砗车、耙、耒刀等农具和一头牛,窗左边绘驴一只,栓于树上,右上部一农夫盘坐于地面休息进食,前置食具,在农夫身后右侧一孩童正手摇团扇(图12)<sup>⑤</sup>。图像所表达的含义并非仅仅展现农具的多样或者农夫在辛勤劳作后,与孩童一起食饭的温馨场景,而是意在表达“争夺农时”的农业思想。



图12 山西长治县小关村 农具图

在古代劳作生活中通常脱离不了“馐”这一活动,“馐”在劳作时为“晌田”之意,也就是送饭至田间。其行为在劳作活动中极为常见,欧阳修在视察河南府属县时写道:“桑野人行馐,鱼陂鸟下梁”<sup>⑥</sup>,曾巩也曾江西《分宁县云峰院记》(分宁县即今修水县)中描述:“分宁人勤生而啬施,薄义而喜争,其土俗然也。自府来抵其县五百里,在山谷穷处。其人修农桑之务,率数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馐,其外尽田,田高下饶腴,随所宜杂植五谷,无废壤。”<sup>⑦</sup>正如上述山西大同东风里辽墓描绘的农夫劳作时,农妇一人挑担行馐。然而,无论是春播还是秋收,或早或晚对粮苗生长以及粮质都有着极大影响,需时刻关注天气、土壤以及作物的状态,确保粮食播种和割获的时机。而田间送饭则是保证农忙期间劳作生产的重要措施,“馐”图形象地叙说了在农作活动中争夺农时的生活现象。农时的把握对于农业生产影响颇深,而墓主作为地主自然极为重视农时,将其以“馐”的形式描绘在墓葬中,希冀佃农能够不误农时,勤农务耕。

① Dieter Kuhn ed. Decoding Tombs of the Song Elite, *Burial in Song China*, Heidelberg: Edition Forum, 1994, pp. 11-12。  
转引自洪知希、滕宇宁、朱美旎:《“恒在”中的葬仪:宋元时期中原墓葬的仪礼时间》,《古代墓葬美术研究》2015年年刊。

② 林文勋:《知识史视域下富民阶层与宋代乡村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6期。

③ 李倍雷:《汉代画像石图像中的文化人类学价值》,《艺术百家》2004年第5期。

④ 赵德才、马岩波:《河南焦作宋代刘智亮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

⑤ 图12引自朱晓芳、王进先、李永杰等:《山西长治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10期,第66页。

⑥ [宋]欧阳修撰,刘德清等笺注:《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卷2被牒行县因书所见呈僚友,中华书局,2012年,第196页。

⑦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卷17记分宁县云峰院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272页。



### 三、生成动因与象征意义

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是永存的,在先民看来“人是‘二元’的人,即‘肉体’的人与‘灵魂’的人,‘肉体’的人有生与死两种状态,‘灵魂’的人则是永生的。”<sup>①</sup>故生人为逝者的灵魂建造生存场所“墓葬”,准备各类衣食住行、饮食娱乐之物,并根据时代的风俗观念,为死者营造一个超自然的、理想的世界。正如宋人胡次炎所言:“省墓之行,展孝敬也。盖墓者,祖宗体魄所藏,魂灵所居。”<sup>②</sup>由此而论,墓葬是生者为逝者建造“灵魂”理想的居所。那么在宋、辽、金时期,农耕图像成为墓葬装饰的组成部分意味着什么?亦是本文问题的核心所在,而且有必要分析图像的生成动因进而解析其象征意义。

#### (一)生成动因

农耕图像的生成动因与其社会的思想观念、墓葬习俗息息相关。

第一,“事死如生”的伦理思想观念。“事死如生”的观念来源于“灵魂不灭”,本质意义是指灵魂永存。《荀子·礼论》中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sup>③</sup>指出逝者在另一世界仍要继续生活,生者对逝者的态度要如同侍奉生者一般,祈望逝者在墓中仍可享如生前一样的生活。“事死如生”的观念早在汉代墓葬中就已有所展现,蒋英炬先生指出汉代画像石在一定程度上是随葬品的代替、扩展与延伸<sup>④</sup>。巫鸿先生也指出“随葬器一旦被埋入墓中,就获得了新的意义,表示死者在一个不同时空中的再生,古人相信死者灵魂具有意识和活动能力,且‘生活’在墓中。”<sup>⑤</sup>说明图像在墓葬场域中不仅是随葬器的替代,且与随葬器有同样的功能和意义,保证了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也保留了现实意义。杨爱国也指出“不只墓室画像石如此,墓室壁画和画像砖的内容也同样有此功能。这些墓室建筑装饰与墓中的随葬品一起共同营造了理想的死后世界。”<sup>⑥</sup>然而不仅在汉代,贯穿于中国传统丧葬礼俗中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不死其亲”,将已逝的亲人视为灵魂和肉体仍存的“活人”,在其观念支配下“事死如生”的丧葬礼仪得到了充分的体现<sup>⑦</sup>。宋、辽、金时期墓葬中的图像同样如此,为逝者在另一世界所构建的理想生活,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一类事物的已知属性或本质规律来暗示或隐喻另一事物的相似性和本质性,以此传达人的思想意识或情感。”<sup>⑧</sup>而农耕图像就是将现实生活中极为重要的农耕生活转移至墓葬中,以此来还原现实中农耕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自晚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出现仿木结构砖室墓,而这一墓葬建筑类型在北宋中晚期后中原地区普遍流行,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指出:“地下墓室是地上居室的反映”<sup>⑨</sup>,可见宋中晚期对“事死如生,事如存亡”的伦理思想观念推到了极致。而这一时期的农耕图像在墓葬建筑装饰中通常被置于重要方位。宋代痴迷堪舆之术,司马光曾曰,“世俗信葬师之说,既择年月日时,又择山水形势”<sup>⑩</sup>,虽图像并非墓葬择址那般慎重,在墓中的置放方位也不会随意置之。自然方位是建筑与环境的生命,注

① 李伯森:《中国殡葬简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11页。

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8243胡次炎,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56册,第118页。

③ 方勇、李波译注:《荀子·礼论》,第2版,中华书局,2015年,第315页。

④ 蒋英炬:《关于汉画像石产生背景与艺术功能的思考》,《考古》1998年第11期。

⑤ [美]巫鸿:《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施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56页。

⑥ 杨爱国:《幽明两界:纪年汉代画像石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⑦ 徐吉军、贺云翱著:《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页。

⑧ 严智龙:《隐喻与图像:艺术的另类解释》,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24页。

⑨ 宿白:《白沙宋墓》,第2版,第111页。

⑩ [宋]司马光,汪郊校:《书仪》卷7“丧仪三·卜宅兆葬日”,江苏书局,1868年。



重方位与礼制合一的空间秩序尤为重要,其中重东南、厌西北是一系列布局的原则方法之一<sup>①</sup>。农耕图像在墓葬中的位置多位于墓室东壁、南壁或东南壁方位,即便不在此方位,也在墓主人视觉范围之内。再者,画工绘制墓葬壁画也是立于墓主角度,是逝者在墓中向外望,并非生者由外向内望<sup>②</sup>。说明墓主对农耕的重视。

第二,孝文化观念。“赫赫炎宋,专以孝治”<sup>③</sup>宋代统治者极力提倡孝道,并认为“孝莫重乎丧”<sup>④</sup>。苏洵在《安乐铭》中曾言:“圣贤千言万语,无非纲纪人伦。竭力孝养父母,劬劳恩似海深。晨昏省候安否,凡事体顺颜情。当效返哺之义,寻思跪乳之恩。追想父母爱我,爱子之心爱亲。为子出入必告,倘若有事可寻。有病不离左右,汤药扶持辛勤。不幸百年归世,厚治棺槨衣衾。”明确指出“孝”不仅体现在生前,逝后之事仍然重要。

宋、辽、金墓内广泛流行绘制二十四孝组图,其中就包含了农耕题材。如长子小关村金墓西壁所绘的“舜子耕田”场景,画面中绘一男子,左手持竿,赶着两头大象行走在田间,左上方有两只飞鸟(图13)<sup>⑤</sup>。又如在山西长治魏村金天德三年(1151)墓中绘“大舜耕田”,图中刻一人二象,男子身穿白色圆领袍服,腰间束带,手持黑色木棍,正赶象耕田的画面。在图像右侧墨书:“舜子少亡母,父瞽叟□□,妻□□舜令淘井将□□压之,孝感神明引东□□井出,天赐二象耕地,百鸟运耕,尧王知孝,乃阐位子舜。”<sup>⑥</sup>虽有些字迹已无法识别,但仍可明白句中其意为耕田耘地的孝行行为可以感动神明。《孝经》中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其中“天之道”则需了解季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自然变化规律,地之利则能够分辨五土,因地制宜<sup>⑦</sup>。可见,图像中的孝行并不单指勤耕务农,还包括掌握农业发展的天时、地利等农业知识,才能真正地做到“以养父母”。明确表达二十四孝图由孝行观念所驱使,那么在孝行组图之外仍进行农耕题材的绘制,更加强调农耕劳动对孝行的重要性,同样也体现了孝行思想文化对农耕图像的催生。



图13 山西长治魏村金墓 舜子耕田

第三,丧葬世俗化观念。从宋、辽、金时期墓葬中可以看出图像不仅限于上述所提到的与农耕场景相关的内容,还包含大量的庖厨、备宴、侍者、散乐以及家居等具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场景<sup>⑧</sup>,整体内容倾向对日常生活的摹绘并呈现出世俗化。世俗图像的运用同时改善了宋时期厚葬的现象,宋时期民间厚葬之风盛行,地主富民们不断冲破礼制“或冒利犯禁,或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之类,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sup>⑨</sup>尽显丧葬之仪的奢侈浮华。在宋时期建造一座墓葬或举办一场丧葬仪式耗资巨大,连相对殷实的官僚、士大夫也曾为丧葬费用深感忧虑,太学教官石介因其所言:“汝不能成若翁之志,吾

① 郑孝燮:《方位与礼制对中国传统建筑与环境所起的作用》,《建筑历史与理论 第五辑》,1993年,第200页。

② 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出的地上宫室》,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52-253页。

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431宋庠一六·孝治颂,第21册,第12页。

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524宋祁四三·孙僕射行状,第25册,第64页。

⑤ 图13引自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文物》2008年第10期。

⑥ 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魏村金代纪年彩绘砖雕墓》,《考古》2009年第1期。

⑦ 胡平生译注:《孝经译注》庶人章第6,第2版,中华书局,2009年,第11页。

⑧ 《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墓室壁画全集3宋辽金元》,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

⑨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3仁宗庆历三年,第2版,中华书局,2004年,第3462页。



不瞑矣!’故介自受命以来,十有七月矣,未尝敢一饭甘、一寝安、一衣暖、一饮乐。坐不敢正席,行不敢正履,终日战战慄慄,若怀冰炭,若负芒刺。”<sup>①</sup>同时,实物厚葬也被盗墓者所觊觎,甚至关中地区“秦人之俗,以开发冢墓为事”<sup>②</sup>。可见,厚葬不仅使生者因丧葬费用困扰,其盗墓的行为使生者的财富丢失,同时还侵扰了逝者的栖息之所。

为此,司马光等人提倡薄葬“谨勿以金玉珍玩置棺中,启盗贼心。”<sup>③</sup>就连当时社会的上层阶级也极力提倡薄葬,北宋范镇就此上疏仁宗:“臣窃闻温成皇后圻中皆以缕金为饰,又以锦绣珠翠金玉衣服实物以备焚瘞者甚多。此等事与死有益,于生无损,尤不可为,况于死无益,于生有损乎?古先升仙丁宁以戒厚葬者,其思虑至深也。”<sup>④</sup>为避免厚葬中的资金困扰和盗窃风险,墓葬的营造者使用象征性的方法,赋予图像象征意义并代替实物存于墓葬中。对此,有学者指出宋人选用具有象征意义的载体代替实物装饰墓葬,为先人营造延续各种现世享受的死后世界,也是实物厚葬到象征符号的转化。而这一行为在表达了对先人慎终追远的同时,更加注重生人福祉,达到互利的作用<sup>⑤</sup>。图像的使用既实现“事死如生”和尽孝的观念,也可防范盗窃风险使墓葬不被侵扰。

## (二)象征意义

墓葬中的图像通常被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存于墓中,那么农耕图像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农耕图像作为墓葬主人与其精神世界的中介,图像面向的主体是墓主人,也就是宋代三等户即以上的地主阶级。在等级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视的就是身份地位,关注的内容自然有所不同,农耕图像正是展现了地主群体在生前、逝后所重视且关注的内容。有学者指出宋代墓葬壁画内容是上升阶级地主阶层腐朽生活和社会心态的形象写照<sup>⑥</sup>。

事实上,农耕题材的图像并非仅仅是彰显财富的一种象征,其背后还隐藏着地主对农业生产的实际诉求,而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农业劳动力。由于北宋时期实施“田制不立”<sup>⑦</sup>“不抑兼并”<sup>⑧</sup>的土地管理政策,对宋代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农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兼并狂潮。宋太祖曾言:“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sup>⑨</sup>地主在此激励下侵吞土地的行为逐渐扩大且延续,拥有大量田产成为宋朝户籍中的“主户”,即拥有田地产业的人户。主户将田地租佃给无地农户,也就是“客户”既无田产也无生产资料的人户,从租佃关系来看“客户”则大都属于佃农。佃农依附地主而生,而上述提到的耕获图、粮食加工以及租佃纳贡图就多次出现佃农的形象。

佃农依附于地主,租其土地,然虽有田种,却依旧因贡赋而致穷困,而地主则因其日益富强。欧阳修就曾言:“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其间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过十余户。其余皆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主百顷而出税赋者一户,尽力而输一户者数十家也。就使国家有宽征薄赋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数十家者困苦常自如也。”<sup>⑩</sup>同样,苏洵也指

① [宋]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四书·上王状元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169页。

②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文集卷第12伊川先生文八·墓志·家传祭文·改葬告少监文》,中华书局,2004年,第661页。

③ 司马光撰,汪郊校:《司马氏书仪》卷5丧仪一·棺槨·大敛殡,江苏书局,1868年。

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863范镇二·论温成圻中不当以锦绣珠翠金玉备焚瘞疏,第40册,第177页。

⑤ 赵兰:《从实物到象征——丧葬世俗化转向下的四川宋代画像石室墓装饰》,《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

⑥ 贺西林、李清泉:《永生之维——中国墓室壁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5页。

⑦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173食货上,中华书局,1985年,第4163页。

⑧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3992王钰·枢廷备检序,第182册,第169页。

⑨ 同上。

⑩ [宋]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年编笺注·》卷59居士外集卷9论辨·时论·原弊,巴蜀书社,2007年,第64页。



出富民之家，通常地大业广，将佃户视为奴仆，在劳作期间仅安坐于四周，监督佃客耕耨劳作，期间无一人违背调度以嬉戏，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sup>①</sup>但同样，地主也需要佃农“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矣”<sup>②</sup>，况且地主的财富主要来源于对佃农实物地租的剥削，地主与佃农之间互相依赖“客主相资，贫富相养”<sup>③</sup>。

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为了能够使得佃客长久地为自己所用，而佃农为避免土地的变动所带来的不稳定状况，双方以订立契约的方式保障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宋时期租佃契约内容大致与土地买卖契约相同，不仅有严格且内容翔实的土地买卖契约的行文规定，还须按法定统一格式拟定契约，《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载：“旧来臣寮申请，乞今后人户典卖田产，若契内不开顷亩、间架、四邻所至、税租役钱，立契业主、邻人、牙保、写契人书字，并依违法典卖田宅断罪。”<sup>④</sup>不仅要写明出租人，还要明确所租土地的位置、四至以及缴纳税租的多少，甚至在契约中提到诚信问题，如若违约，保人则有义务替佃农缴纳税租。如《乙亥年索黑奴等租地契》：

乙亥年二月十六日，敦煌乡百姓索黑奴□□□子二人，伏缘欠阙田地，遂于□易□□护□上，于城东忧渠中界地柒亩，遂租种□。其地断作价值，每亩壹硕二斗，不谏诸杂色，□并总收纳。两共对面平章。立契已后更不许休悔；如若先悔者，罚□□□驮，充入不悔人。恐人无信，故立此契。

租地人

租地人索黑奴

见人汜海保<sup>⑤</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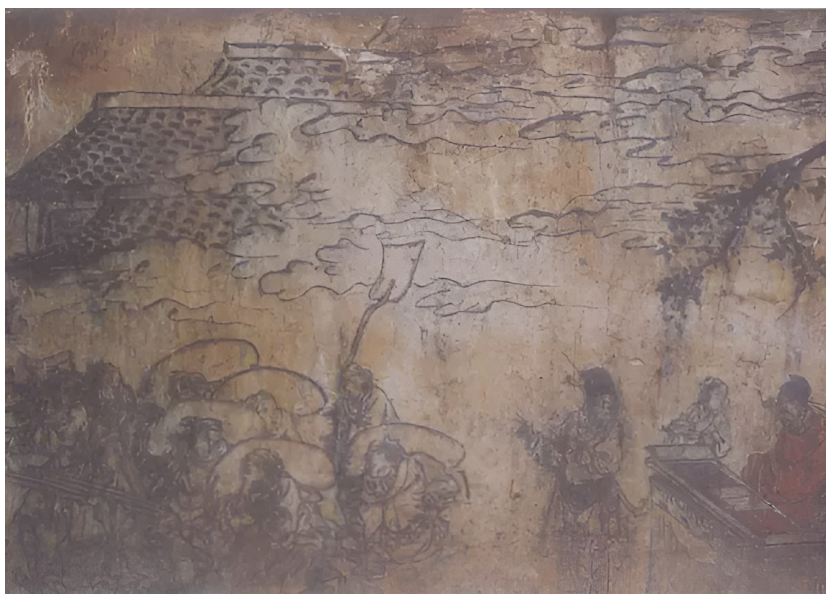


图14 张氏镇宋墓 交租图

① 郑麦编：《江标集》卷4政治经济言（节录）卷3·重农·苏洵论田制，中华书局，2021年，第259页。

②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884苏轼36·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第87册，第181页。

③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6634卫泾23·潭州劝农文一，第291册，第381页。

④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61，中华书局，1957年，第5906页。

⑤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五）契约、文书·（乙）典租·乙亥年索黑奴等租地契，中华书局，1961年，326页。



通常佃农只需按照契约内容履行义务即可,而地主也不可提出除契约以外的附加要求。张氏镇墓室东壁正是绘制了一幅按照契约缴租纳贡的图像(图14)<sup>①</sup>,画面左侧内容绘一群佃农或肩负粮袋、或手持农具、或托帛物向粮仓而去,右侧绘制地主以及侍从正看向朱红漆面桌案上的契约,似在清点租额<sup>②</sup>。虽然设立租佃契约关系,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实现地租剥削<sup>③</sup>,但佃农于地主,地主于佃农都是极为重要的关系。

租赁契约的内容不仅指土地,还将犁、牛和其他生产类农具租以佃农使用,宋人陈舜俞说“千夫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sup>④</sup>毛羽也曾言“偶为灼龟逢吉兆,再供租约赁耕牛”<sup>⑤</sup>。农耕图像中所描绘的佃农、耕牛、农具等装饰元素正是将地主身份与农业生产联系起来,生产力是农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劳动者也是最为活跃的因素,是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也就是佃农。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地主墓中多次绘制佃农的形象。从上述白沙宋墓的租佃图中看到地主淡定祥和地坐于主位,一旁侍者奉其左右,看着佃农手捧金银、粮酒进行纳贡。主人面带微笑,姿态慵散,身着奢华服饰。而佃农的表情紧张,动作小心翼翼,着粗布衣衫且光脚行走,二者对比鲜明,身份地位的差距形成强烈的反差和视觉冲击。图像借以神情、衣着以及环境表达了不同人物的内在心理活动,不仅展现了地主的财富与地位,还展现了佃农纳贡时墓主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暗示着佃农是在勤农务耕的状态下而得以按时纳贡。

## 结 语

经过分析与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宋、辽、金时期的墓葬艺术中,农耕图像的一致性揭示了辽、金两国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进行文化吸收与模仿,这一现象不仅映射了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广泛交流,也反映了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深刻过程。其次,农耕图像在宋、辽、金时期墓葬中的集中表现,与当时社会对墓葬功能与意义的认知和态度紧密相连。自宋朝以降,随着堪輿术的盛行,人们开始将祖先的墓地视为影响后代福祉的重要场所,墓地因而被赋予了更为神圣的象征意义,不再仅仅是死者的安息之地。因此,墓葬中的农耕图像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它们不仅象征着财富与地位,更是地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高度重视和对佃农勤农务耕期许的体现。考古资料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并非中原宋人所独有,而是一种跨越民族界限与习俗,在宋辽金时期普遍存在的心理倾向。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图14引自刘迎春:《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3期,封二。

② 刘迎春:《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6年3期。

③ 漆侠:《宋代封建租佃制度及其发展》,《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④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1537陈舜俞4,第70册,第370页。

⑤ 湛之编:《杨万里范成大资料汇编·范成大》,中华书局,1964年,第148页。